

历史和文化视角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俄] 安德烈·齐甘科夫

内容提要：在影响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众多内外因素中，一个应予以考虑的基本决定性因素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俄罗斯独特的国家信仰体系。这个体系所代表的价值观源于俄罗斯特殊的宗教（东正教）、民族（斯拉夫）与地理背景。同西方的关系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在长达几个世纪与西方国家交往的过程中，俄罗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了合作、防御与强硬三种模式，而这些模式都可以通过对俄罗斯国家信仰体系的分析 and 理解而获得解释。

关键词：俄罗斯 外交政策 大国荣誉 文化信仰

前言

为系统地探究俄罗斯的国际行为，本文将在更长历史语境（自19世纪初以来的历史）下展开讨论。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对俄罗斯外交政策起到了特殊作用，在与西方关系中俄罗斯分别采取了合作、防御与强硬（assertiveness）的模式，这些模式直到21世纪仍在继续。俄罗斯作为基督教大国的身份鼓励俄罗斯统治者频繁加入西方国家联盟，反对那些在它看来在欧洲内外挑战基督教团结的国家。这一模式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的“9·11事件”后，俄罗斯承诺提供重要资源，协助美国和欧洲国家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然而，当俄罗斯统治者感到其自身利益不再被尊重之时，便拒绝与西方国家合作，采取防御型政策或者强硬的做法。这些行为的例子有：俄罗斯对于西方决定扩张北约持强烈反对立场，克里姆林宫于2008年8月对格鲁吉亚使用武力的决定，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

1 [俄] 安德烈·齐甘科夫 (Andrei P. Tsygankov) 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

及俄罗斯在2014年2月乌克兰发生革命性政权更替后的一系列行动。

本文认为，对国家权力、安全与福祉的考虑在俄罗斯的决策当中都很重要，但它们不具备独立的因果关系。与此相反，这些因素都取决于俄罗斯国家的文化信仰。即使俄罗斯的行为看似与国际体系其他成员的行为并无二致，这样的行为也可能源自文化独特性，含有与其他行为体不同的意义。一个荣耀的大国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文化信仰，尽管俄罗斯的荣誉观陈旧，但经过历史演变，在西方行为影响和俄罗斯自身国内发展的条件下，内涵多种多样。¹ 当俄罗斯意识到其荣誉感被承认时，便与西方一致行动；当缺乏对其荣誉感的承认时，便采取独立的外交政策。根据国内实力的强弱，俄罗斯可以表现为防御型大国或态度强硬的大国。

本文研究俄罗斯—西方关系中的三种核心模式：合作、防御、强硬，从文化视角对三种模式进行解释，并选取普京国际战略中的最近案例进行分析。笔者认为，普京的战略符合俄罗斯长期形成的强硬外交政策的模式，这是因为西方不愿承认俄罗斯的价值与利益，同时因为俄罗斯认知中的国内自信。结论部分总结了主要发现与论点的影响。

历史视角下的俄罗斯外交政策

在处理同西方的关系时，俄罗斯的政治家在历史上发展出了合作、防御、强硬三种政策。这些模式反映出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维护其利益与价值观的能力。当这三种政策中的任何一种被采纳时，它们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促进俄罗斯优先利益的方法、对西方国家关系的承诺程度以及这些政策在国内引发的反对声音。

与西方合作的传统强调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性，把西方当作历史与文化的盟友，主张对西方忠诚、与西方合作。另外一些人则强调要维护本国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与利益。他们将俄罗斯视为独立的大国，能够自由选择最符合其愿景和国家利益的国际同盟。这一派别对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忠诚度较低，尤其当他们认为西方的行动没有考虑俄罗斯的认同与利益时更是如此。他们相信俄罗斯在世界上的特殊作用，更多考虑民族主义的价值观与社会义务，而不是对西方国家的忠诚。与提倡防御政策的人不同，强硬政策的支持者主张超越灵活结盟与柔性平衡策略，采取更为自信、进取与单边的方式维护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上述每种传统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与政治条件下都曾被付诸实践。

第一种模式是与欧洲合作，它根源于弗拉基米尔大公于公元988年接受基督教的决定。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蒙古桎梏后，俄罗斯通过发展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以及在此后加入对抗奥斯曼帝国的神圣联盟，来寻求强固其基督教根基。彼

1 关于荣誉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作用更加全面的分析，参见：Andrei P.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得大帝向重要的西方国家派驻俄国使节，借用西方的技术成就，努力加强与欧洲的关系。叶卡捷琳娜大帝宣布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强国”，并且通过继续限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影响来证明这一地位。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建立神圣同盟，镇压欧洲大陆上的革命活动以帮助欧洲的专制君主。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与普鲁士、奥匈帝国成立“三皇同盟”，但后来转向了英法联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保持其与英法这两个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的联系。

与欧洲和西方合作的传统甚至到苏联时期仍在继续。布尔什维克先是靠和平共处的主张，后是靠遏制希特勒德国的集体安全来寻求西欧国家的承认。20世纪70年代，苏联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赫尔辛基协定》。此后，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共同欧洲家园”的外交政策中，把这份促进人权和“人类共同价值”的协定作为基础。苏联解体为俄罗斯更加接近西方创造了条件，因为俄罗斯试图强调自己与西方国家在制度和所面临威胁方面的相似之处。

除了结盟与制度建设，俄罗斯还站在欧洲一边进行了几场战争，其中最重要的战争有：对抗瑞典的第一次北方战争（1655—1660年）、对抗普鲁士的七年战争（1756—1763年）、对抗拿破仑法国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最近的全球反恐战争。

第二种模式是面对欧洲和西方世界所做出的防御性反应。当俄罗斯统治者在国际上未能成功达到目标时，当他们感到没有从西方获得与其付出的努力相当的支持时，他们偶尔会退到相对孤立状态来积蓄国内力量。17世纪初莫斯科被波兰打败后，在20年间俄罗斯没有诉诸武力，直到165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到了18世纪，俄罗斯在对瑞典的战争期间有20年保持中立，以便恢复财力、充实人口。在（19世纪中叶）克里米亚战争中遭遇败绩后，俄罗斯再次采取积蓄力量、灵活结盟的政策来恢复其在欧洲和黑海地区丧失的地位。布尔什维克的“和平共处”与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是防御型外交政策的苏联版本，采取这样的政策是为了恢复因革命和内战造成的国内羸弱状况。此后，斯大林与希特勒站在一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苏联领导人希望使国家免遭动荡国际局势的影响，为国内改革争取更多时间。冷战结束后，俄罗斯通过在西方国家、中国、印度之间的周旋，寻求在苏联解体后恢复元气。

第三种模式，俄罗斯历史上就以采取对西方强硬的政策著称。当俄罗斯认为它处在强大地位时，在西方国家不支持自己后，它也常常单方面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在17世纪，俄罗斯与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进行了多场战争，试图控制边境、保护巴尔干的斯拉夫人。18世纪初彼得大帝击败瑞典，使俄罗斯变成了一个欧洲强国。与土耳其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克里米亚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同主要的欧洲大国作战。19世纪70年代，在国内的状况恢复后，俄罗斯重返巴尔干，打败了土耳其。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发明了“世界革命”，从而挑战了既有国家体系的根基。他们根据这一指导思想采取行动，于1920年对波兰发起进攻，指

望借此打败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冷战期间，苏联努力在东欧、巴尔干、伊朗北部确立其地缘政治存在，在未获西方国家支持的条件下采取行动。苏联还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和1979年向阿富汗出兵中表现强硬。更近的例子是，俄罗斯不顾美国和欧盟对自己“霸道”、“改变现状”行为的警告，干涉了格鲁吉亚—南奥塞梯地区的军事冲突。

俄罗斯的文化信仰

俄罗斯外交政策受到历史形成的信仰体系的影响，这一体系或者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中得以维护，或者是当俄罗斯自信满满时便单方面采取行动加以捍卫。俄罗斯价值观的根源不应被降低到国际权力竞争和维护主权的层面。表面上的权力斗争可能具有更深层的保护和增进道德价值观的含义。在历史上、在国际交往的过程中，每个政治共同体都发展出独特的价值观体系。俄罗斯的信仰体系是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俄罗斯荣誉植根于东正教，其内涵包括一种独特的精神自由观，和建立一个强大并受全社会保护的国家的理念，这样的国家有能力保护臣民对内免受欺压，对外免遭威胁。

俄罗斯外交政策受到历史形成的信仰体系的影响，这一体系或者是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中得以维护，或者是当俄罗斯自信满满时便单方面采取行动加以捍卫。

在为俄罗斯人选择基督教的时候，弗拉基米尔大公不仅是做出了宗教选择，也是为自己的国家决定了长期的社会共识、国家荣誉和国际承认的基础。¹ 对俄罗斯人来说，东正教成为接下来几个世纪身份认同中至关重要的部分。² 在国内，教会主张建立新型社会关系，反对血腥报复，提倡稳定婚姻，人道地对待底层阶级。在东正教传统影响下，俄罗斯人形成了一种国家义务，即尽最大可能向臣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在俄国15世纪开始领土扩张之前，指导俄国大公的是一套详尽的、以村社为基础的、宗教福利机构的原则。用谢尔盖·普拉托诺夫的话说：“教会为世俗社会提供了更美好、更人道生活的范例，在这种生活中无论富人穷人都能得到保护……教会影响到了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从大公的政治行为到每个家庭的私人生活。”³ 弗拉基米尔大公的选择从对外关系和安全的视角看也至关重要。俄国不再是受孤立的外省领土，而是处在当时是世界文化发展中心的大拜占庭文明的轨道上。⁴

1 关于莫斯科公国时期个人荣誉以及诉讼在维护荣誉中的作用，参见：Nancy Shields Kollmann, *By Honor Boun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James H. Billington, *The Icon and the Axe*, New York: Vintage, 1976; P. J. S. Duncan, *Russian Messianism*, London: Routledge, 2000.

3 Sergei Platonov, *Polnyi kurs lektsii porusskoi istorii*, Petrozavodsk, 1996, pp. 96-97.

4 Sergei A verintsev, *Krescheniye Rusi i put' russkoi kul'tury*, Moscow, 1990.

建立起国家的东正教基础之后，俄国感到对居住在俄国以外、与自己信仰相同的人的生活负有责任。15世纪中叶，拜占庭陷落于奥斯曼之后，俄国宣称自己是第三罗马，或是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在18—19世纪，俄国与土耳其进行了多次战争，原因之一即保护上百万生活在土耳其帝国中的基督徒的权利——这些人占土耳其帝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强。

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的信仰中融入了大国的成分。近代以来，俄罗斯与敌对的欧洲各国拥有一条很长的边境线，“与任何近代早期的帝国相比，它所遭受的入侵更为频繁，且军队规模更大。”¹ 在增强军事竞争力的同时，俄罗斯也付出了代价——本国制度与欧洲制度的相似性降低了。俄罗斯国家在承担对外防御的重任时，越来越回避在国内担负保护俄罗斯公民自由不受侵犯的责任，因此，它（在制度上）落后于其他重要国家。用格奥尔吉·维尔纳茨基的话说：“专制与农奴制是俄国人民为了国家生存不得不付出的代价。”²

俄罗斯的信仰——东正教、强大国家、对文化盟友的忠诚——在俄罗斯悠久历史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9世纪的价值观包括东正教、专制制度、对外东正教徒和斯拉夫人的支持。20世纪初，面对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之为欧洲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战的“内战”，³ 俄罗斯国家历经突变。新观念建立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一党制、对全世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之上。作为俄罗斯历史中国家形态的异常阶段（非自然阶段），⁴ 苏联体制重复了旧有价值观的某些方面，但形式则完全不同。宗教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替代，专制国家被一党制统治所替代，对东正教徒的义务被对意识形态同盟的义务所替代。然而，不管苏联的专制主义和集权本质如何，它为人民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许多人有理由尊重新体制，并为其感到骄傲。后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国家正处在设计一种新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这种意识形态架构将包括俄罗斯文明、复兴的国家实力、对海外俄罗斯人和亲俄罗斯团体的支持。当前，克里姆林宫负责意识形态的官员们认为，俄罗斯是西方的一部分，但它是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在国内外拥有重要义务的“主权民主”国家。⁵

1 Marshall T. Poe, *The Russian Momen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50.

2 Allen Lynch, *How Russia Is Not Rul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

3 J. M. Roberts, *A History of Europe, 1880-1945*, New York: Viking Adult, 1997.

4 Tim McDaniel, *The Agony of the Russian Ide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西方苏联学家认为的常态是俄罗斯历史发展中由外部危急情况下强烈的生存需要决定的。关于最早论述旧俄与新俄之间的承继性的著作，参见：Nikolay Berdyayev, *Istokii smysl russkogo kommunizma*, Paris: IMCA Press, 1937。

5 关于俄罗斯仍在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分析，参见：Aleksei Chadayev, *Putin i yego ideologiya*, Moscow: Yevropa, 2006; Alfred B. Evans, *Power and Ide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2008; Marlene Laruelle, *In the Name of a 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9。

国内外事态的发展，都对俄罗斯的国际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¹ 在外部事态的影响方面，一般来说，欧洲和西方扮演了“重要的他者”（significant Other）的角色，并在俄罗斯关于国家认同的辩论中举足轻重。正是欧洲和西方营造了俄罗斯统治者维护其国家荣誉与利益的环境。² 在历史上，俄罗斯一直试图得到西方国家这一他者的承认，并且仿效西方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俄罗斯关于自己是西方世界一部分的主张几乎不为西方所接受，但这些主张反映出了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一股强大的国内推动力。这种要与西方文明获得一致身份认同的力量能够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总是寻求通过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俄罗斯总是会对西方的行为有所回应——当克里姆林宫中掌权的是改革派领导人时——并准备修好，寻求合作，而非对抗。

然而，文化是一个相互的概念，它的含义可能随着外部事态的重要变化而变化。每一次俄罗斯开始向重要他者靠拢时，只要它能感受到来自西方各国足够积极的承认与回报，莫斯科就会尽可能持久地延续这一行动。俄罗斯的文化透镜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文化透镜，这种透镜是由本国独特的历史记忆、与历史上同盟的关系以及当代的挑战构成的。例如，俄罗斯与斯拉夫人和东正教盟国有紧密的传统联系，只有当其行动不损坏这些关系时，它才能表现为自信的大国。当外部缺乏对俄罗斯价值观和利益的承认时，克里姆林宫持改革思想的领导人便会遭到主张更具防御性或更强硬政策者的反对。国家并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在相对开放的时期，不同的政治团体和社会团体所支持的各种思潮为取得在统治阶层中的主导地位相互竞争。基于国内各方对独立外交政策的信心状况，³ 俄罗斯在决定政策取向时可以选择防御性政策，或是选择强硬政策。

所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形成动因比从古典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进行的观察更为复杂。现实主义者只强调了大国及其塑造国际体系的能力这个方面，而注重文化的观点则指出，价值观有多种不同含义，大国威望只是其中之一。建构主义认为这种威望只是更普遍渴望“与西方一样”的一种表达。如果西方国家是大国，俄罗斯也想成为大国。然而，如果西方显示出在制度建设、经济繁荣、人权保护等方面的成就时，俄罗斯的统治者也为这些成就所吸引，并试图

1 对俄罗斯认同构建中的国际与国内变化的讨论，尤其可参见：Ted Hopf,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ne L. Clun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ussia's Resurgen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Deborah Wels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2 这一论点的展开论述，参见：Iver Neumann, *Russia and the Idea of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6; Robert English, *Russia and the Idea of the We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国内信心一定程度上是物质力量的产物，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精英对权力认知的产物。关于俄罗斯精英对权力的算计，参见：William C. Wohlforth, "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4, No. 3, 1987; Iver B. Neumann, "Russia's Standing as a Great Power, 1494-1815," in: Ted Hopf ed., *Russia's European Choice*, London: Palgrave, 2008。

在国内复制这些成就。除了上述两个外部因素以外，俄罗斯还有一种历史上形成的国内价值观，它源于俄罗斯特殊的宗教（东正教）、民族（斯拉夫）与地理背景。

俄罗斯当代的强硬政策

普京再次担任总统以来的事态发展，反映出俄美关系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总体上的极度脆弱性。尽管克里姆林宫在阿富汗稳定、反恐、经济发展等问题上继续与西方国家合作，但俄美在其他重大问题上意见均有分歧。这些问题包括：反导系统，中东，俄罗斯国内体制以及乌克兰。克里姆林宫不仅表达了不满，还采取了行动。

当选总统后不久，普京以取消出席北约芝加哥峰会的方式，表明他对美国在反导系统上的立场不满。他坚持俄罗斯在叙利亚和中东采取不同（于西方）的立场，拒绝支持西方主导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他还进一步强调，由于西方的核政策，俄罗斯感到不安全。尽管普京表示愿意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合作，但他认为更为紧迫的是解决美国在欧洲的反导系统问题。¹ 当美国由于斯诺登事件而取消美俄峰会时，莫斯科正式表示准备继续对话，几乎没有显示出任何失望的迹象。克里姆林宫似乎也没有被西方对俄罗斯政治体制和人权记录的批评所影响，继续推动“反马格尼茨基法案”，限制西方非政府组织和激进反对派在国内的活动。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的决定说明普京已做好准备接受俄美关系恶化的后果。俄罗斯与西方在乌克兰2014年2月革命的问题上也存在重大分歧（详见下一节）。

如果不将克里姆林宫对其信仰、利益、行动能力的认知以及缺乏西方国家的承认这两方面考虑进来，人们就很难理解普京的强硬战略。

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意味着他将继续通过挑战西方国家现有地位，为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争取新角色。2008年《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已经提出，在西方逐渐退出世界经济中心的条件下，俄罗斯仍然坚持“平衡的、多维的思路”。² 2013年2月，俄罗斯发布新的《外交政策构想》，进一步发展了向多极国际体系结构过渡的思想，并提到出现了核武器以外的新威胁。《外交政策构想》的开篇句子指出，“历史上形成的西方主导全球经济和政治的能力在持续降低”，“世界实力和增长的潜力趋于分散，正向东方尤其是亚太地区转移”。³ 这份文件还强调了全球经济竞争，指出这种竞争将检验不同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文明认同”将具有新的重要意义。俄罗斯开始认为自己在文化上、政治上独立于西方。

1 David M. Herszenhorn, "Russia Won't Renew Pact on Weapons with U.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2, 2012.

2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Kremlin.ru, July 12, 2008.

3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Kremlin.ru, February 18, 2013, <http://www.mid.ru/bdomp/ns-osndoc.nsf/e2f289bea62097f9c325787a0034c255/c32577ca0017434944257b160051bf7f>, 2015-03-25.

普京价值观中的国内优先事项包括巩固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打造一种能团结俄罗斯族和非俄罗斯族的新理念，这也同梅德韦杰夫（Medvedev）有关。自2012年初以来，普京一直推广“国家—文明”的理念，这一理念承认俄罗斯族是连结布帛的织针（核心），从而使“俄罗斯能够形成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¹ 在提出用俄罗斯族的价值观来凝聚整个国家时，普京也反对那些“宣扬建立‘俄罗斯族的’、‘单一民族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不符合我国千年的历史”，是“摧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体系的最短路径”。² 普京特别关心国家团结，他提到了“精神价值不足”的问题，并建议加强“传统价值载体的各机构”，尤其是家庭和学校。他还在多次讲话中进一步批评了自己眼中欧洲正在背离传统宗教与家庭价值观的现象。在瓦尔代俱乐部（Valdai Club）会议的发言中，他引用了俄罗斯传统主义思想家的观点，宣称“在精神、意识形态和外交领域中对独立和主权的渴望”是“我国完整民族性格的一部分”。³ 在2013年对联邦会议发表的咨文中，普京再次将俄罗斯定位为“保守”力量和世界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⁴

普京的意识形态转变引发了国内的共鸣。全球范围内的不确定因素，加之西方的压力，刺激了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思潮复萌。主张用外交政策维护俄罗斯主权与文化独特性的群体在政治圈与决策层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诸如俄罗斯铁道部部长弗拉基米尔·雅库宁等官员们，在他们的演说和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力主俄罗斯文明（Russia-civilization）的概念。⁵ 一些东正教神父，包括大牧首基里尔，支持以俄罗斯宗教为核心的文明独特性的观点。相对于权势阶层有些边缘化的政治家，如共产党领导人根纳季·久加诺夫，在谈到俄罗斯国家利益时，往往将其与欧亚地缘政治和俄罗斯的自力更生相联系。为推广俄罗斯独特的文明价值观，一些俱乐部得以创立。例如，2012年9月8日成立的伊兹博尔斯基俱乐部（Izborsky Club），成为一群知识分子、专家和政界人士的母体组织，他们支持欧亚主义、新苏联思想和亲斯拉夫信仰，而这些思想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各种鼓吹民族主义的媒体和智库

主张用外交政策
维护俄罗斯主权与
文化独特性的群体在政
治圈与决策层中变得
越来越有影响力。

1 Vladimir Putin, “Samoopredeleniye russkogo naroda – eto politnicheskaya tsivilizatsiya, skreplennaya russkim kul’turnym yadrom,” *Nezavisimaya gazeta*, January 23, 2012.

2 Vladimir Putin, “Samoopredeleniye russkogo naroda”; 除了这些观点外，2012年12月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到2025年的新国家民族政策，这一文献重新将俄罗斯定义为“由多民族人民的俄罗斯国家（Russian nation）构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文明实体”，在国内穆斯林选民的压力下，删除了以俄罗斯族为国家核心的说法。（*Kommersant*, December 19, 2012）。

3 Vladimir Putin, “Meeting of the Valdai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Club,” September 19, 2013, <http://president.kremlin.ru>, 2015-03-25.

4 Vladimir Putin, “Poslaniye Prezidenta Federal’nomu Sobraniyu Rossiyskoy Federatsii,” December 13, 2013, <http://president.kremlin.ru>, 2015-03-25.

5 Yakunin 2012, 2013.

关系密切。

西方国家批评克里姆林宫不尊重人权，俄罗斯对此无动于衷。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不相信莫斯科有兴趣深化与西方的合作，主张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政策。2012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充斥着关于俄罗斯“侵略成性”的喧嚣。尽管发生了俄格战争，但贝拉克·奥巴马仍然在他的首个任期内于2009年初迅速“重启”对俄关系，与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建立起了紧密关系。“重启”外交缓和了克里姆林宫对北约东扩和华盛顿全球政权更迭战略引发的地区动荡的恐惧。然而，自奥巴马连任以来，对俄罗斯的批评变得愈发激烈。究其原因，除了普京再次掌权以外，还由于克里姆林宫采取了一些让华盛顿很难接受的新政策。对于普京试图重新施展对国内、欧亚地区、中东和乌克兰的权力，西方国家的反应尤其激烈。西方领导人还对其他事情表达了不满，如克里姆林宫处置抗议者的手段、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Sergei Magnitsky）的案件、关于禁止在未成年人中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的新法律，等等。

全球金融危机后，尽管俄罗斯的经济走势疲弱，普京仍然感到有足够的自信心来采取强硬的行动。这一思维说明：在他对国际均势的评判中，西方的主导地位已经败落。西方掌握全球权力的能力在两个主要方面遭到了挑战——俄格战争打破了美国在欧洲在世界政治中使用武力的垄断局面；全球金融崩溃则暴露出西方经济的脆弱性。全球经济危机使俄罗斯遭到重创，但这场危机也改变了西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克里姆林宫现在期待西方停止其独断专行的做法，例如北约东扩与推广民主，并承认俄罗斯、中国与其他国家是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中的平等伙伴。莫斯科新的国际姿态是对西方提出的挑战的双重回应：在利益相同的领域开展有限的合作，在不可能合作的领域内以大胆自信 / 积极的方式促进建立替代性的国际联系。

乌克兰危机

乌克兰局势是俄罗斯与西方分歧的一个主要例证。2014年2月，克里姆林宫出于对乌克兰政治与军事动荡继续恶化的担忧，采取了干涉行动。按照普京的说法，西方国家是乌克兰发生革命性政权更替的幕后力量，他们根本不明白造成这种动荡局面的后果。为给干涉克里米亚正名，俄罗斯总统称，他是代表虽被推翻但仍合法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采取行动的。之所以必须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需要保护俄罗斯的黑海舰队，阻止该地区由“纳粹分子、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暴乱”造成的暴力及侵犯人权的局面。¹ 当美国和欧盟正在考虑针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而采取各种步骤从国际上孤立俄罗斯的时候，普京明确表示反对，称其

1 Vladimir Putin's Press-Conference, Kremlin.ru, March 4, 2014, <http://eng.kremlin.ru/news/6763>, 2015-03-25.

行动完全合法，“如果我们坐视这种不受控制的犯罪扩散到乌克兰东部，如果人民向我们寻求帮助，而且我们已经受到合法总统的官方请求时，我们保有使用一切可能手段保护这些人民的权利。”¹ 俄罗斯谴责西方政府破坏折中协定，拒绝承认基辅新政府。克里姆林宫要求基辅克制使用武力、启动新的宪法修订工作、保证保护说俄语居民、在国内进行权力下放改革。俄罗斯还将克里米亚并入自己的版图，向乌克兰东部的抗议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此外，俄罗斯还在俄乌边境集结了约3万军队。尽管乌克兰已经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负债累累、无力偿还，但俄罗斯政府仍然对基辅提高了天然气价格。

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及克里姆林宫在乌克兰危机中的作用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立场。美欧支持乌克兰新政府，承诺向其提供经济与政治支持，要求俄罗斯撤军，停止向乌克兰境内的抗议者提供援助。为惩罚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和其他行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对俄罗斯的主要官员和一些经济部门采取了制裁措施。

普京从他维护俄罗斯信仰和利益能力的角度看待乌克兰危机。² 俄罗斯的利益包括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与舰队。克里姆林宫感到必须将克里米亚并入自己版图，因为它担心基辅提出加入北约的要求——在维克多·尤先科任内，乌克兰不顾莫斯科的反对一直采取这一政策。克里姆林宫的许多官员不再相信，基辅的兴趣只限于成为欧盟成员国，而是认为基辅将欧盟成员国当作通往北约之路的特洛伊木马。对俄罗斯同样重要的还有信仰问题，这包括支持俄语和对历史的共同认知。除语言问题外，对莫斯科尤为重要，俄罗斯和乌克兰曾共同打败纳粹德国。基辅废除了关于俄语的法律，限制俄罗斯媒体的报道，成立了一个民族主义分子为主的新政府。乌克兰革命给了俄罗斯的民族帝国主义者机会，他们受到了乌克兰制造的新版历史的侮辱——这种历史贬低苏联对打败纳粹的贡献，美化与纳粹合流反对苏联、残暴参与大屠杀的斯捷潘·班杰拉（Stepan Bandera）。新政府中的重要职位现在都被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的成员所把握，这些人将自己的政治根源追溯至班杰拉。西方国家从未谴责如此民族主义版本的历史，还支持宣扬这种历史观的人，这加重了俄罗斯人被基辅背叛的心理感受。

结 论

本文所提出的方法强调了用国家信仰解释俄罗斯外交政策。俄罗斯的信仰包括国家对外和对内的象征，例如与西方的特殊关系、大国威望以及国内体制的自

1 Vladimir Putin's Press-Conference, Kremlin.ru, March 4, 2014, <http://eng.kremlin.ru/news/6763>, 2015-03-25.

2 细节可参见：Tsygankov, "Vladimir Putin's Last Stand: The Sources of Russia's Ukraine Policy," *Post-Soviet Affairs*, 2015.

豪感。丰富的历史经历教会俄罗斯统治者同时与多个相关群体——西方国家、国内民众、文化盟友——保持关系的价值。俄罗斯人从未将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定义为一个反西方的体系，事实上，他们把西方的认可视为这个价值观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便可以说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合作的诸多历史案例，包括缔结神圣同盟，尝试合作，在20世纪初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防范崛起的德国，以及后来在21世纪初共同反对恐怖主义威胁。

然而，当俄罗斯眼中的重要他者（即西方）挑战其行动和价值时，俄罗斯便不再采取合作态度。在这样的案例中，俄罗斯接近非西方的支持者，根据国家荣誉中非西方的成分采取行动。在认为自己弱小的情况下，俄罗斯统治者会在国际上小心谨慎，避免采取他们认为虽然必要但不可能持续的行动。这方面的例子有韬光养晦（Recueillement，戈尔恰科夫于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采取的政策——译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和平共处，或者冷战后试图阻止北约东扩等。在这些案例中，俄罗斯统治者感到有必要保护国外的文化与意识形态盟友——东正教徒、共产主义者以及苏联解体后亲俄罗斯的人，但是俄罗斯缺乏采取果断行动的信心。在这些情况下，俄罗斯的典型做法是集中力量维护自身的大国威望，避免就其荣誉中的其他成分采取行动。

当俄罗斯进入信心增长阶段时，可能会为推广其价值观采取更为大胆果断的行动。

当俄罗斯进入信心增长阶段时，可能会为推广其价值观采取更为大胆果断的行动。西方未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这就可能鼓励俄罗斯单独行动，正如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冷战、2008年8月俄格战争和乌克兰危机中所做的那样。这些案例并不仅仅关乎大国威望和安全。每一次俄罗斯也受到符合文化和意识形态定义的责任感驱使而采取行动，以保护那些在

确定自身价值观时与俄罗斯有牢固联系的人。

当代俄罗斯对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高度不确定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包含了合作、强硬和防御三种因素。国际体系由于美国的相对衰落、全球经济危机及地区动荡而不断变化。其他大国，例如中国、印度、巴西对国际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存在许多分歧，如克里姆林宫对反对派的处置，斯诺登事件，对乌克兰及其他一些后苏联国家的外交政策等。面对所感受到的西方压力，俄罗斯采取了强硬政策。俄罗斯虽不赞同西方，但在包括核武器、中东稳定的各个方面等许多安全问题上采取了防御性政策，而非诉诸实力。最后，克里姆林宫在保持西方对经济发展项目的投资、稳定阿富汗局势、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上寻求与西方国家合作。由于缺乏互信和各方均可接受的制度框架，未来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可能遭遇更多危机，双方关系的进展将会是缓慢和渐进的。

（戴惟静 译；关贵海、徐彤武 校）